

民航滄桑史

(三)

民航隊 · 民航 · 亞航公司

● 李能宏

白色恐怖心有餘悸

五十年代的台灣，正值戒嚴時期，一切都受限制，爲了國家安定，不得不如此，民航公司成長快速，人員衆多頗受治安機關的注意，因爲飛行人員出國的機會多，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多，一九五〇年兩航員工投共，台北有一部份人，是原來的公司派來服務的，也有一部份在大陸淪陷後逃到香港轉轉來台的，這些人都是被調查的對象，兩航員工以後也有人進入民航公司，像業務處M處長就曾在火燒島被關過（因爲他是中航員工），報務員的職務最敏感，時常被別人調查、問話，飛行報務員的調查更嚴，一發現有問題，就不准飛，通信中心一位王姓同事，從海軍退役後，考入民航公司，在電台工作，已經考取了招商局商船報務員，可是上不了船，原因是他在海軍時常發牢騷，資料紀錄不良，其實，年輕人有時發幾句牢騷，算不了什麼，可是被列入紀錄就很麻煩，這位同事，以後找人幫忙才上了船，已結婚生子，生

活很美滿，劉進厚兄和筆者剛進公司時，爲了考試，天天晚上練習打字，也被注意過，後來經過說明，誤會就解開了。

民國四十一年的一個晚上，台灣全省發生了一件大事，憲兵和衛戍部隊出動大隊人馬，名義上是抓逃兵，實際上見了像當過兵的人就抓，那時逃兵很多，大多沒有身分證，這種人被抓，還說得過去，有證件的，將證件撕碎或收去，也照抓，卡車裝滿人就開，一連幾天，夜夜抓人，許多人都跑到郊外田野中躲避，幾天後，機關、學校員工有的被抓，小販、三輪車夫失蹤，公司機場也有人被抓，一時人心惶惶，聽說抓了幾千人，都運到金門，補充兵源，進厚兄和筆者都是從軍中下來，雖有離職證件，但也難免不被抓。有一天晚上軍官帶槍兵來總辦事處（中正路）叫門，被看門的智根榮老先生（曾任憲兵連長）給唬走了。那幾天電訊處處長雲非天天晚上加班，智老先生向帶隊的軍官說：這裡是陳納德將軍的民航隊，你們看外國人還在樓上加班，此地沒有逃兵，三言兩語

把他們打發走了，當時進厚兄和我，就睡在樓下小房間裡，如果進門搜索難免不會被抓，逃過一劫，都很感激智老先生。

公司每班飛機都帶公司的對內郵包，調查局花蓮、澎湖站的文件，也由公司郵包轉送，他們派人送來，取走，來往的文件都是密封的，二十多年都沒有出過差錯。總統府的文件，是由一位游秘書送來，來往都是專車接送，游秘書北平人，一口京片子，和氣斯文，像個教授，聖誕節前，都送些禮物（香水、巧克力糖等），禮貌真週到。有一次，一個從香港來的郵包裡，發現一捆散開的人民日報，筆者在軍中學過情報智識，對敏感的事很機警，馬上原封不動送到安全處，請求處理，副處長蔣曙東問明情形，將人民日報留下，郵包交還。第二天又找筆者去問話，筆者把當時所見到的情形又重說一遍，以後就沒下文了。

松山機場聯檢處發生了一個笑話，一本美國生活雜誌（Life）雜誌上刊登了美國總統尼克森和毛澤東的合影像片，那個年代凡

有朱、毛的照片，一律在頭上要蓋上「匪酋」藍圖章，蓋印的老兄蓋錯了，把「匪酋」蓋在尼克森的臉上，這個大笑話，當時傳遍了松山機場。現在想起來更可笑。

民國四十幾年，胡侗青（遠東航空公司老闆）在松山機場成立飛行社，專門教導客人開飛機和到南部送報紙僅有一架斯西納小型教練機（傳說是一位蔣姓朋友提供的）他有一個職員韋大衛，廣西壯族人，曾就讀於空軍官校，愛運動、喜愛音樂、善作曲，曾創作過許多歌曲，因開舞會和輔導長鬧意見而退學，和他一起退學的鄒鵬飛，東北人，以後進了民航公司，在機場修護組服務，彼此是同學，都在松山機場，所以常在一起，小韋學過開飛機，常教客人開飛機，在松山機場上空附近盤旋。有一天他帶著兩個人騙空軍衛兵說試剎車，把飛機開到大陸去了，這一下可闖了大禍，凡是小韋的朋友都被調查，小鄒也在被調查之列，小鄒民航公司的同事也在被調查之列，一連串的訪問、搜索、調查，鬧的許多人心神不安。被白色恐怖所籠罩，事情確實是小韋的個人行為，只是一時衝動，逃到大陸，做出損害朋友的事，聽說小韋在大陸做了人大代表，滿風光的。他害苦了台灣的許多朋友，可能始料未及吧？事隔四十年了，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。

權責分明各司其職

民航公司在台北總公司，有員工三、四

百人，那麼大個公司，沒有會議室，沒有會客室，僅在公司大門口（在四十六號時）有四把椅子，供會客之用，搬到中央大樓後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這就表示，這是辦公的地方，不適於會客，沒有會議室，就表示，從不開會，免得浪費時間，總公司沒有打卡鐘，也沒有簽到簿，從沒有人遲到早退。公司供給開水，沒有報紙，上班後，財務處的計算機，各辦公室的打字機都響起來了，權責分明，各司其職，升級、調薪。都由各單位主管先打好薪給調整申請表（RPA）報給上級，上司許可後，再轉給人事處，許可後，就調薪，調薪的時間不固定，數額也不固定，調薪預算由財務處編列，各單位按規定的預算範圍內執行。公司對內文件的信封，（比郵局的標準信封大三分之一），用厚牛皮紙印的，上面印了十幾個格子，分別是收件人姓名、單位、地點、摘要，用過一行，劃掉一行再用，寫下一行，一個信封可以用十幾次，每天收，送都要登記，一個信封，每天會在收發室來回數次，由此可見工作效率之快，收發人員每天處理來往的電報和信件，下班後，該裝郵包送外站的，該送公司各單位的，一齊出清，不准留到明天。要會稿的公文，五、六個單位，一上午就可以會完。

有時電報送給收報人，他當場就在那張電報背面寫回電，這樣快的工作效率，真是驚人，下班鈴一響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按時回家，加班的時間很少，一切只重實際，不講形式，同事們相互的稱呼，不稱職稱，男士稱先生、女士在姓氏前加一個（Miss）或直接叫名字（多半都有英文名字）。凡公司單位名稱更改，人事變動，重要規定發表，有關單位發出一份循環通報單（CIRCULAR）通報各單位，員工看過後簽名，就算完成作業手續，沒有人敢賴皮說不知道。

全體員工享有福利

員工每年有兩個星期的休假（原先不休假可積存起來，離職時按薪水金額發給，後來因不休假的員工太多，改為強制休假）。每年有兩星期病假，多請假扣薪水，久病不愈者解雇，因公受傷者，另有規定。

休假期間可以免費乘公司飛機國際航線一次，國內航線有空位即可搭乘，不限次數（包括直系親屬）。

本人和直系親屬，可以免費到公司醫務室看病，或打各種預防針（小兒麻痺卡介苗，公司由美國代為購買，須自費）。

員工可在薪給中留十分之一在公司儲蓄，離職時，公司發給相同數目之金額（民航公司創舉）。

女性員工產假四個星期。

部分員工可由公司付學費到台北徐州路語言中心學習英語，考試不及格者，則由自己付學費（不是全體員工，只限與外籍人士直接接觸者）。

退休時，按年資發給退休金，亡故時有

撫恤金。遣散時有遣散費。

最大的福利是由大陸隨公司來台的役男，可以憑民航隊發給的服務證明免服兵役（稱國防工業員工，太特權了）。

業務擴展須要輪班

電訊中心以前的名稱是「收發室」，初期的收發室，設在總辦事處二樓，地址是中正路（現在的忠孝西路）火車站對面的一棟兩層樓房。辦公的地方，是在二樓玄關，設備很簡陋。一個櫃台（收信件電報用），三張辦公桌，一部收報機（專通松山機場電台）

總管理處的面積只有一百多坪，樓下是貨運組，二樓有機航處、總飛機師室、統計室、新聞處、總務副總經理室、辦公人員共三十餘人，收發室僅五人。主任關敏可女士，職員周璇彩小姐、稽元芳小姐、劉進厚兄和筆者，僅有一部電話二二三〇六號。當時只有環島航線及包機，收發室工作單純，民國四十二年民航隊改組成民航航空運公司，增加國際航線，業務擴展快速，遷至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六號辦公，新辦公室是七棟連在一起的四層樓建築，共有將近一千坪，本來只租了六棟，左邊的一棟房東一部份租給山東同鄉會，一部份自住，以後七棟都被公司租下來。收發室擴大了，並增加了小型總機，電台改成電傳打字機（TELEX）設備也增加了，辦公人員增加到十五人，因業務需要改為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值班。一部份人員按辦

（三）史桑滄航民

公時間上班，電話總機改兩班制，打電傳打字機的輪大夜班，早班（0700—1500）中班（1500—2300）大夜班（2300-0700），晚上十一點以後，都由大夜班一人負責，（電話總機，進出郵包，來往商電（COMMERCE CABLE）），還要利用電話報電報和抄回覆電報，如無特別事故發生，平常的業務，也要忙五、六個小時。如果要報電報，抄電報那就慘了，忙起來一夜都無法休息。

總經理葛蘭第的工作與眾不同，他上午十一時多才到公司，一直到夜間八、九點，如果要和華盛頓辦事處副董事長得歐勒（GEORGE DOOLE）講長途電話，有時到凌晨一、二點才離開辦公室。

電話局國際長途台的接線小姐們，最怕葛蘭第和美國通話，一通電話講兩三個小時是常事，那個年代通美國的電話線路不多，遇到聯合國開會，政府官員要和駐美官員聯絡，往往很久才能接通，通了話後，要盯著看總機的訊號，紅燈一亮，表示已講完話，馬上拆線，還要登記通話時間，下一步工作就等他走了，臨走時，一定有電報發給華盛頓，電報要打在商電電報紙上，然後叫車務處派車送到北門口電報局去發，以後電傳打字機可以經過電信局轉接，直通華盛頓辦公室，只是省了派車去送，要先打好帶子，等轉接後再能將帶子放過去，有時線路不空，要等一、兩個小時才能接通是常事，除了由電傳打字機來往的電報要處理外，（可以看

電報內容自己判斷，是否需要打電話報給收報人），有時報給對方，對方要回電，就要抄下來回電，最麻煩的是由電信局送來的商電，公司規定，私人名字的商電值班者不准拆開，要問收報人如何處理，對方若說明天上班再說，那就沒事，若對方說「打開讀給我聽」那就要打開念給對方聽，若要回電，就要抄下來回電。

有一次筆者值大夜班，收到一份史頓普董事長（GENERAL STUMP）的電報，他住在總經理葛蘭第家，半夜打電話給總經理，告訴他有史頓普的電報，他也不能做主，就把史頓普喚起，筆者向史說：「有電報給將軍我可否打開讀給將軍聽」，史回答說：「當然可以」，於是筆者將電報打開讀给对方聽：史聽後哈哈大笑，連聲說：「謝謝」電報上只有三個字（HAPPY BIRTHDAY LOVE）。

有一天晚上接到業務處長陳熊文（MOON CHEN美籍華人）的電話，他說要發電報到美國，當抄到一半時，其中有一個字聽不懂，他重說一遍，還沒聽懂，他急得說了中國話，國會議員哪！我只知道（CONGRESSMAN）是國會議員，不知道（LEGISLATOR）也是，當時羞愧萬分。

改名亞洲航空公司

民國五十年後，公司業務擴展迅速，四十六年總公司辦公處又不夠用，又租了同一

路段一〇八號中央大樓，該大樓為一新建的八層大樓，除第八層租給勝家公司外，其餘七層全租給民航公司，收發室此時擴大為「電訊中心」(COMMUNICATION CENTER)，在四樓辦公，除電傳打字機外，電話總機，換成二部，共二十條外線，內線分機一百門，一班增為兩人，又增加了電腦，通越南電台和無線電直通電話(VOICE)。工作人員增至三十餘人，大夜班值班增加至三人。

這時民航空運公司已改名為亞洲航空公司，業務都照常只是股權轉移而已，韓戰時，民航公司以日本立川(TACHIKAWA)為基地，空運補給品支援美軍，賺了許多美金(在美國付款)，越戰起後，又出租飛機給美軍和越南政府，幾十架飛機投入越南戰場，通訊處派了許多同仁到越南工作，雖然有危險，但是有美金津貼可拿，還是視為肥缺，來往電報由每天一百多份，增加到二百多份，飛機失事的電報幾乎每天都有，定名為(XOXO)凡是這種電報，五分鐘內要送給相關單位，夜間要用電話報給對方，電話總機開始使用「會議電話」許多人可利用電話開會，在國內還是創舉，這是亞航業務鼎盛時期，是國際長途台的大客戶，每月電話費數十萬元，是郵政局的大客戶，郵票錢一個月也是幾十萬，一封寄華盛頓的信件，郵資上千元是普通的事，有一年美國反共名人麥加錫競選參議員，陳納德發了一份聲援電報

到美國，加長的電報紙(約長四十分分)共打了八張，據電報局職員說，這是他們所見到的最長電報，當時估計報費將近一萬元(是筆者五個月的薪水)，那個年代，公司職員很盛行集郵，郵局每出一種新郵票，發售之日，門口就有許多人很早就去排隊購買，民航公司是中山支局(第九支局)的大戶頭，要買郵票的，只要事先向C先生(專跑郵局的)登記一下，他到郵局直接找王局長，買多少套郵票都行，集郵確實有好處，民國五十三年筆者購買房屋(永吉路)時，急需用錢，賣了一部份郵票應急。通訊中心的設備，在那個年代，不數第一，也數頭幾名，國際電報局報房，曾到公司來參觀過，他們都很羨慕我們的工作環境和高薪。民航公司的同事們大多數都很滿足和惜福。

陳納德的情報活動

「為了民航公司的工作需求，以及美國政府給的沉重情報任務，陳納德將軍在那個冬天仍舊忙得不可開交。我十分清楚他的情報活動……」

以上是陳香梅女士在她所著的一千個春天，十六章裡的片段。據筆者觀察，民航公司安全處和新聞處的外籍人士(不全是美籍)都有情報任務，筆者服務民航公司二十二年(一九五〇—一九七三)新聞處和安全處主管調動最頻繁，約四年調動一次(好像有任期)其中一位新聞處處長，麻溫·普雷克

(MPLAKE)下班後，時常來辦公室，來去匆匆，(筆者服務之收發室，二十四小時有人值班)同事們私下談論，這個老美的舉止很像情報員，一個星期天的中午，總經理葛蘭第來辦公室辦公，電報局送來一份電報，收報人MR GRUNDY我馬上把電報送到他辦公室，他離開辦公室時，交下一份電報，內容是：各站轉交麻溫·普雷克，速回台北(TO ALL STATION MPLAKE RUSH BACK TAIPEI)。他接電後，翌日即回台北，瞬即離台返美，據說他是被驅逐出境，事情發生在民國五十年前後，筆者曾和秘書處丹麥籍同事舒而慈(SCHULTE)談起此事他說我太大驚小怪。

民航空運公司改組後，改名稱為亞洲航空公司，遷移到中山北路二段一〇八號中央大樓。收發室擴大，改名稱為電訊中心，和安全處同在四樓辦公，在安全處旁有一約五坪的小房間，重新用鋼筋水泥間隔，裝的大安全門，整天大門緊閉，僅有兩個神秘洋人出入，據說是美國軍方秘密電台，政府治安機關曾來察看過，顯然已經知曉，民營公司裝設電台，(廣播電台除外)實在少見，安全處的特別任務也很明顯。(未完待續)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